

重探太巴塌部落的空間慣習：

作為東亞觀念史／概念史的批判性補遺

林 榮 康^{*}

摘 要

本研究以花蓮縣太巴塌部落為民族誌場域，探討其空間慣習如何在日本殖民統治與戰後國民政府的現代治理體系下，歷經命名替換、語義剝離與地景知識的邊緣化等過程。透過厚描法記錄地名歌謠、儀式空間與口傳語彙實踐，本文指出：太巴塌的空間知識不僅為文化實作，更可視為具備歷史層疊性與語義張力的地方觀念系統。文章結合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的「語義張力」、劉禾（Lydia Liu）的「觀念混成」與James Scott（1936-2024）的「隱形文本」等理論視角，批判東亞觀念史／概念史中長期以漢字文本與帝國知識為中心的局限。本文主張，原住民族的空間實踐應被視為觀念史／概念史書寫的主體之一，不僅補遺現有敘事，更可能重構以部落實踐為起點的「去中心化觀念史／概念史」範式。

關鍵詞：太巴塌部落、空間慣習、觀念混成、地名政治、東亞觀念史／概念史

^{*} 作者現為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Revisiting Spatial Practices in Tafalong:

A Critical Supplement to East Asia Conceptual History

Jong-kang Lin^{*}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Tafalong community in Hualien County as an ethnographic site to examine how its spatial practices have undergone processes of toponymic replacement, semantic detachment,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landscape knowledge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and the postwar modern governance system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hrough thick description documenting place-name songs, ritual spaces, and oral vocabulary practic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afalong's spatial knowledge constitutes not only a form of cultural practice but also a localized conceptual system characterized by historical layering and semantic tension.

By integrating Koselleck's notion of "semantic tension," Lydia Liu's concept of "conceptual hybridity," and James Scott's theory of

^{*} Ph. 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idden transcripts,” the article critiques the long-standing limitations of East Asian intellectual history that center on sinographic texts and imperial knowledge frameworks.

This study contends that indigenous spatial practices should be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primary subjects in conceptual historiography, not merely to supplement existing narratives but potentially to reconstruct a “decentralized conceptual history” paradigm originating from tribal practices.

Keywords: Tafalong community, spatial practices, conceptual hybridization, toponymic politics, East Asian conceptual history

重探太巴塢部落的空間慣習：

作為東亞觀念史／概念史的批判性補遺

林 榮 康

一、緒論

「東亞觀念史／概念史」（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ast Asia或East Asian Conceptual History）是一個關注於東亞地區思想、概念、價值、制度的一門「觀念」學科，主要探討觀念／概念如何在不同文化的時空中生成、傳播、翻譯與再詮釋。多數觀念／概念體系的形成，源於傳統思想積澱與近代殖民、現代化進程中產生的新概念影響，但是對於臺灣原住民族而言，基於歷時性意識形態的演變、跨文化互動與翻譯、語境化的思想脈絡、以及文本的實證分析而言，少見被納入「東亞觀念史／概念史」之中，而易被排除於這套文字與政治的知識體系之外。

東亞觀念史／概念史，如何能夠從歷史流變與文化互動的歷程中，透過臺灣原住民的口傳知識、儀式實踐、地方記憶與語言系統，聚焦於少數文化的研究議題，以廣闊的視野納入原住民的世界觀，將土地、祖靈、地域的理解；身體化實踐；祭儀行動的慣習；語言概念系統的語境……等傳統觀念，不受限於漢式語言文本與各學家的概念，而重新並被納入「東亞觀念史／概念史」體系之中，這對於臺灣原住民族而言是一件相當重要的課題。

（一）「東亞」如何與原住民族在歷史中交會？

「東亞」並非自然疆界，而是隨帝國擴張、殖民治理與現代國族形成而演變的歷史場域，原住民族的空間與文化在此過程中被逐步納入漢語系統論述，構成多重疊加的歷史交會點。¹

首先，在清帝國治理臺灣原住民族時，出現了「熟番與生番」、「化內與化外」等分類制度，²這些區分不僅反映了中華帝國對邊陲族群的治理模式，也影響了臺灣原住民族空間觀念的政治意涵。此一治理形式，並非單純的控制與壓制，更涉及將原住民納入一種儒家「化民成俗」的秩序之中，⁴從而對其空間實踐與命名方式產生深遠影響。

日本殖民時期以後，臺灣原住民族的部落空間被重新測量、命名、改編，強調以科學測繪與行政區劃分的現代治理，另一方面也藉由教育制度將「皇民化」（こうみんか）⁵意識形態內化於族群日常生活中。⁶例如，原始地名逐步被其他語言所替代，⁷族語地

¹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London: Verso, 2006), 83-140.

² 詹素娟：〈熟番身分論：以日治時期的身分登錄為中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文化創造與社會實踐」研討會（2008年11月7-8日），頁1-19。鄭瑩憶：〈仰沾聖化、願附編氓、康雍朝「生番」歸化與番人分類體制的形構〉，《臺灣史研究》第24卷第2期（2017年6月），頁1-32。

³ 張啟雄：〈東西國際秩序原理的差異——「宗藩體系」對「殖民體系」〉，《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9期（2013年3月），頁58-62。

⁴ 吳進安：〈清領時期臺灣書院教育的儒學思想〉，《漢學研究集刊》第1期（2005年12月），頁116-118。

⁵ 楊志誠：〈「皇民化文化」、「皇民化意識」與「台灣主體意識」〉，《海峽評論》第123期（2001年3月），頁30-32。

⁶ 周婉窈：〈日本在臺軍事動員與臺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1937-1945）〉，《臺灣史研究》第2卷第1期（1996年6月），頁85-126。

⁷ 林慧君：〈臺灣日治時期地名變更小考——從日語觀點來看〉，《臺大東

名成為「古名」、「別名」，僅存於耆老口述與儀式之歇後語中，致使原住民的地景知識因而隱入非主流的知識系統中。而戰後國民政府延續前殖民體制，透過國語教育、土地登記與地名漢化政策，對原住民族空間進行再結構，使其進一步服膺於漢人國族敘事框架。⁸因此原住民族與「東亞」的交會，並非來自平等的文化交流，而是透過語言、命名、知識體系與行政制度等權力機制的運作，使其空間慣習與世界觀逐步邊緣化。⁹

這些被邊緣化的知識與實踐成為後殖民時期重構「地方觀念史／概念史」的重要資源。故本章擬通過原住民族口述歷史、地名復振、儀式重建等方式，揭示東亞學術主流敘事的單一性局限，以此回應東亞現代性的中心敘事，進而構建從「原住民空間出發的地方觀念史／概念史」。

（二）殖民現代性建構中的原住民族觀念史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臺灣（1895-1945），是一段原住民族生活世界被大幅重塑的歷史時期。由於日本政府針對臺灣原住民族所實施的「理蕃政策」相關法令，主要由臺灣總督府依據「六三法」等特別立法權發布，涵蓋了軍事、行政、教育等多方面對於理蕃的治理措施。透過殖民政權在原住民族地區推動「理蕃政策」，不僅是

亞文化研究》第3期（2015年10月），頁141-156。作者從日語的語音（讀法）、文字（漢字讀寫方式）、以及當地地理環境（與日語之間的關係）三個面向，檢視日治時期臺灣的官方改名或書寫慣例。這些面向共同決定了「替代」的深度；若改名時採取日語習慣的漢字讀法或選字（使其對日本語用者連結到既有地名或語義），則「替代」將更為徹底。

⁸ 林素珍：〈原住民族歷史轉型正義：空間之歷史記憶的建構〉，《原住民族文獻期刊》第37期（2018年12月），頁3-20。

⁹ Leo T. S. Ching,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對邊陲區域的武力控制，也是一種文化重構與空間治理策略，其核心目標之一，就是將原住民族納入殖民國家的現代性規範之中。

在教育方面，日本政府自1908年起，對於原住民族部落陸續設置蕃童教育所與公學校，強制推行日語教育與「皇民化」思想，並排除原住民原有的語言與文化知識體系。這種教育制度不僅改變原住民族的語言使用模式，也重塑其身分認同，使原住民逐步內化成為「帝國臣民」的角色。¹⁰因此教育成為形塑殖民現代性的核心工具之一。

其次，戶籍制度的實施，亦是現代國家治理的象徵。在日本殖民體制下，原住民族被編入戶口調查與人口統計之中，藉由命名制度、婚姻記錄與居住登記，將原本以家族、部落為單位的社會組織，重構為殖民國家可以掌握的資料結構。¹¹這不僅是行政管理的手段，更是對傳統親屬網絡與部落空間秩序的深層干預。

再者，殖民政府對部落空間的「再編」，包括聚落遷移、道路開發、部落集中、邊界重新劃設等措施，皆是以現代化為名，進行空間的強制重組。原住民傳統的地名被日本地理命名系統取代後，族群對地景的記憶被壓縮進官方地圖與土地登記冊中，原有的空間敘事便逐步遭到遺忘或邊緣化。¹²

這一系列制度與措施，促使原住民族在語言、身分、空間與記憶層面經歷了劇烈的轉型，構成殖民地特殊版本的現代性過程。這種「被殖民的現代性」並非自我選擇的結果，而是透過制度性再現

¹⁰ 王錦雀：〈日本治臺時期殖民與教育政策之演變〉，《公民訓育學報》第11期（2002年2月），頁131-157。

¹¹ 鄭正誠：〈日治時期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原住民調查（1909-1922）〉，《臺灣文獻》第53卷第4期（2002年12月），頁25-48。

¹² 蔡志偉：〈民族法主體之建立：臺灣原住民族自治之視角〉，《臺灣原住民族法學》第1卷第1期（2016年7月），頁77-86。

與治理工具，深植於族群日常生活中。因此，日本殖民時期的教育、戶籍與部落再編，不僅是社會技術的應用，更是現代性概念植入的歷史過程。

（三）「觀念交涉」視角

劉禾（Lydia Liu）強調翻譯在帝國主義與現代性建構中的角色，並提揭出「觀念混成」（conceptual hybridization）與「語義衝突」（semantic conflict）等概念，¹³關注於翻譯作為一種文化與政治實踐，如何在跨語際交流中產生新的觀念結構與語義張力。

然而，阿美族作為臺灣原住民族群之一，在殖民與後殖民的歷史過程中，同樣的長期處於語言、知識與文化遭遇異質政權干預的狀態。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中，「觀念混成」與「語義衝突」兩個概念，有助於我們理解原住民族，如何在殖民語言體制與知識結構中，進行文化的再配置與意義的對話與協商。

所謂觀念混成，指的是當不同語言體系、文化概念或社會制度彼此接觸時，原有的觀念被解構，並與他者的語義元素重新組合，形成新的混合型概念。然而阿美族在日治時期與國民政府統治下，面對日本語與華語主導的現代化敘事與教育語境，導致傳統的空間概念、親屬稱謂、地名記憶與儀式語彙逐漸被新的語詞與認知框架

¹³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45. 文中第一部分與第二部分，作者描述的翻譯動態中蘊含：（1）觀念混成（conceptual hybridization），透過翻譯過程中來自不同文化語境的概念被組合、揉合，生成了帶有混合性質的新思想或語意結構。在書中多次出現在中西文化交互中產生的新詞彙以及現代話語建構中。（2）語義衝突（semantic conflict），透過來自歐日的概念嫁接進中文語境中時，原有語義與文化語境難免發生碰撞，故引發理解上的張力與差異。

混入。如太巴塢部落舊沼澤原地名為 *sironironay*，目前已被其他語言地名所替代，但族人仍以口傳方式保留原地名的語義記憶與神話敘述，形成語義上混成的雙語結構狀態。

所謂語義衝突，則強調當一個原生詞彙或概念被強制翻譯成主流語言時，原有的文化內涵與制度意義可能出現偏移、簡化或被誤讀的現象。例如漢語自治、文化保存等政治詞彙，在政策中看似接納原住民訴求，但實際卻因制度語境的不同，造成實踐層面的語義張力與錯置。¹⁴

這些語義衝突並非單純的語言誤解，而是根植於不對等的知識體制與歷史權力結構中。阿美族卻在面對現代性壓力下，不斷在殖民語言與族語之間進行翻譯、協商與再詮釋的過程，促成了一種具批判性的「知識混成實踐」（hybridized knowledge practice），也成為當代原住民族在法制、教育與文化復振領域中重新建構主體性的核心策略。

基於以上分析，在學術意義上，必須打破「東亞等於漢字文化圈」的狹隘觀點，從而拓展觀念史從文字中心轉向多語系、多元知識系統，來彰顯臺灣原住民族不只是被治理者，更是觀念生產者與歷史詮釋者，臺灣原住民觀念應該被納入東亞觀念史／概念史中。但是面對挑戰並重構「東亞」與「觀念史／概念史」的學術基礎與方法，這樣的研究將不只是一種補遺，而是一種去中心化、重構思想地圖的批判行動。

¹⁴ 張學謙：〈聯合國追求語言多樣性與語言人權對台灣國家語言發展法的啟示〉，《新世紀智庫論壇季刊》第84期（2018年12月），頁53-61。

二、東亞歷史語境中生成與轉化的文化觀

本單元採用批判的觀點看待東亞觀念史／概念史，嘗試將其範圍擴展到漢字文化圈之外，將本土空間慣習概念視為情境化、具體化和歷史協商的傳統知識。

（一）觀念史／概念史的擴展與批判

「觀念的歷史性」與「語義張力」（semantic tensions）理論，不僅改變了歐陸歷史學對語言與概念的看法，也為今日東亞與原住民族跨文化觀念史／概念史的研究，奠定了方法論的基礎。¹⁵然而觀念／概念的歷史性（historicity of concepts），並非超歷史性的理性範疇，而是「歷史時間中的語義實體」。這個觀念／概念正因為它們在歷史中不斷變動、重構，並在不同語境中扮演不同角色，所以東亞觀念史／概念史借鑒Reinhart Koselleck（1923-2006）的概念史理論與Michel Foucault（1926-1984）的知識考古學，這些西方理論模型側重辭彙與思想變遷分析所指出觀念史／概念史的概念，不只是記錄歷史的工具，因為它們本身就是歷史的行動者。由於觀念／概念來自過去，具有傳統與沉積性，所以觀念指向未來，具備社會期望、政治爭論與變革場所的能動性。因此，自由、國家或進步這類的政治詞彙，便隨著社會條件改變，其語義會產生斷裂與重組，所以此種詞彙可謂之「爭議性概念」（contested concepts），¹⁶即其歷史性強、語義張力大、經常在政治與思想論辯中被重新詮釋。

¹⁵ Reinhart Koselleck, "Social History and Conceptual History," in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 trans. Todd Samuel Presner and others, with a foreword by Helen Whi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0-37.

¹⁶ Koselleck,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114-130.

在歷史中，「語義張力」概念在時間軸上，形成一種「語義的多重性與張力」。這種語言現象稱為「時間層疊」（Zeitschichten），¹⁷代表每一個觀念都承載著過去意義的沉浸位層，同時也被用來描繪或塑造未來。這讓觀念成為歷史變遷中最敏感的場域之一。所以，當社會經歷劇烈變動發生革命、殖民、現代化時，觀念／概念的語義張力將特別顯著，因為語詞無法即時調整以應對新的經驗與期待，從而產生語義衝突與歷史意義的生成，最終觀念史不僅關心語詞的語源學與語意學，更重視其「歷史時間經驗的結構性變遷」。

以上所關注的不只是「觀念／概念是什麼」，而是「觀念／概念是如何在歷史過程中被使用、爭奪與改寫」。這一觀點對於非歐陸地區的觀念史／概念史研究，正如臺灣原住民族的觀念而言極具啟發性。因為原住民語言中的空間詞彙、祖靈概念、土地敘事等，正為那種具有歷史層疊與語義張力的詞彙，在殖民、現代化與文化復振過程中扮演了能動的角色。「觀念／概念的歷史性」與「語義張力」的闡釋，強調語詞在歷史變遷中的主動性、語義的時間層疊性，以及觀念在政治與社會語境中被爭奪與重構的特質，這些理論為我們分析任何文化群體的概念，尤其是阿美族的部落「界域」，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

（二）批判傳統東亞觀念史／概念史偏重漢字文化與帝國知識的局限

從「東亞觀念史／概念史」的角度對其傳統脈絡進行反思與批判時，可以明確指出其長期以來偏重漢字文化圈，與帝國中心知識所造成的理論與實證局限，以下具體從幾個層面進行論述：

¹⁷ Koselleck,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100-114.

1. 漢字文化中心的局限：排除多語言、多族群觀念／概念形構的可能性

傳統東亞觀念史／概念史大多建構於中國、日本、韓國等「漢字文化圈」之中，視漢文典籍與儒家經典為觀念生成的主體文本。這種觀點雖有其歷史連續性，卻同時排除了東亞內部龐大的非漢字使用社群，當然也包括臺灣原住民族在思想生成中的角色。

漢字系統作為權力書寫的工具，象徵著一種文化排除與階層化的制度。例如，原住民語言缺乏書寫傳統，並不代表其思想不具系統性，而是現代觀念史／概念史研究方法尚未開發出能夠解讀其「口述性」與「空間性」的思維。因此，過度仰賴文字文獻，卻忽視了觀念／概念的多模態存在（multi-modal existence of concepts），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偏狹，特別是阿美族無文字文化的隱形文本（hidden transcript）。¹⁸

2. 帝國知識的霸權與歷史敘事的單一化

東亞觀念史／概念史長期受限於帝國中心視角，無論是清帝國的中央治理秩序、近代日本帝國的殖民規訓，或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敘述策略，都形塑出一種自上而下、以帝國官僚與士大夫為思想主體的敘述方式。孔飛力在《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第二章〈從太平天國事變到戊戌變法：馮桂芬與歷經磨難的變革進程〉中，指出地方菁英馮桂芬如何在國家改革語言（公開文本）之下，實際運用地方資源進行權宜調整；其表面是響應國家「強兵自強」的口號，但卻兼以公開「改革」話語與地方真實的社會慣習保有自己的運作模式，這種運作模式便具備政治上「隱形文本」的概念，可作用於分析原住民族通過非書面知識抵抗殖民治理的機制。¹⁹

¹⁸ James Scott, "Domination, Acting, and Fantasy," in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17-40.

¹⁹ 孔飛力（Philip A. Kuhn）著，陳兼、陳之宏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

隱形文本，係指邊緣群體在主流權力壓制下，通過非書面、非公開的知識實踐（如口傳敘事、儀式行為、在地化命名等）形成的抵抗話語，其不同於官方「顯性文本」（official transcript）的規訓邏輯，而是以「隱蔽性」與「實踐性」為特徵，遂成為弱勢群體維護文化主體性的重要機制。例如，在太巴塢部落的殖民歷史中，族人通過保留族語地名的口傳記憶（*sironironay* 的語義傳承）、祭儀空間的身體實踐等，正是「隱形文本」在非書面知識體系中的具體體現，可用於分析原住民族如何通過日常實踐抵抗殖民空間治理。

因此原住民族知識與日常實踐，在此體系中往往被視為「非理性」、「前現代」或「文化殘餘」的邊界。例如，部落的空間慣習、口傳神話、耕作儀式等，鮮少被納入觀念史／概念史的討論中，因為它們不符合「抽象理性化」的敘述期待。²⁰然而，正是在這些地方知識中，我們才能看到非帝國中心的觀念／概念如何以身體、地景、儀式等方式得以延續與創造。

3. 觀念史／概念史方法論的局限：對非文字性與空間性觀念的忽視

東亞觀念史／概念史取徑於Koselleck與Foucault的史觀及知識，這些為西方進行詞彙與思想變遷的理論模型分析，本身即預設了以下的看法：

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4年），頁113-140。作者指出馮桂芬的思想與經歷被作為一種「案例文本」，他透過思想論辯與實務提案中，折射出中國晚清「從帝制向現代國家」過程中，某些潛在、但未必被明言的結構性議題，在本單元中可以提供做為隱性文本的引例。

²⁰ James Scott, "Nature and Space" and "Cities, People, and Language," in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01-102.

- (1) 以書面文獻為主體的書寫語言、知識的變遷。²¹
- (2) 具有連貫、漸進的歷史性。²²
- (3) 思想史的對象主要是政治、倫理、歷史等「高階抽象領域」。²³

以上三點在理論方法上的核心張力與批判空間，確實觸及了「東亞觀念史／概念史」或更廣義的跨文化觀念史／概念史。這些觀察多數是針對「觀念史／概念史」作為一套起源於西方歷史學傳統的理論模型，當其應用於東亞語境時，所面對的預設與局限。²⁴這樣的做法使之難以處理原住民空間慣習中，所體現的「空間性文化概念」，例如，「禁忌地、共享地、祖靈場域、循環的時間觀、季節儀式與族群記憶」等主題。因此，若東亞觀念史／概念史能夠真正具包容性，勢必要開發臺灣原住民族能夠處理非書寫性、非國家性、非帝國性，無文字「隱形文本」，²⁵所形構觀念史／概念史的研究方法。

4. 補遺與超越：原住民族觀念實踐作為「東亞觀念史／概念史的批判性補遺」

面對上述局限，我們可提出以原住民族空間慣習、儀式實踐與語言敘事為素材的「觀念史／概念史補遺」，作為一種反身批判（reflexive critique）的方式，並且重新思考「觀念／概念」的形

²¹ Reinhart Koselleck, "Historia Magistra Vitae: The Dissolution of the Topos Into the Perspective of a Modernized Historical Process," in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 Keith Trib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eith Trib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2004), 26-42.

²² Shmuel N. 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129, no. 1 (2000): 1-29.

²³ Carol Gluck and Anna Lowenhaupt Tsing, eds., *Words in Motion: Toward a Global Lexic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3-305.

²⁴ Reinhart Koselleck, "Historia Magistra Vitae," 26-42.

²⁵ Koselleck,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100-114.

式、來源與承載方式。這些觀念／概念並非不具歷史性，而是其歷史性往往被壓制於文字帝國之外。

以阿美族太巴塢部落為例，*sironironay*（舊沼澤）、祖靈地景與部落空間禁忌的理解，體現了具強烈時間厚度與倫理秩序的觀念／概念結構。這些觀念／概念並非從漢字經典衍生而來，而是在族語、歌謠、身體行動中一再被實踐與再生。若東亞觀念史／概念史能納入這些「非中心」觀念實踐，不僅可彌補其內在局限，更可能開拓觀念史的新方法與倫理視野。

至於傳統東亞觀念史／概念史所仰賴的漢字文化與帝國知識，雖構成其學術體系的骨架，卻也導致對多族群、多語言、多形式思想的排除。唯有透過對地方知識、非文字性思維與族群實踐的重視，才能真正解構其中心主義局限，推進一種多元共構的東亞觀念史視野。

（三）引入臺灣原住民知識體系作為「觀念／概念的另類生成場域」

臺灣原住民知識體系作為「觀念／概念的另類生成場域」，是一項對傳統觀念史／概念史研究進行根本性方法論重構的企圖。此舉不僅試圖打破以文字、帝國、國家為中心的知識生產結構，也開啟了對「觀念／概念何以生成」這一基本問題的全新理解。

1. 觀念／概念生成的主體性重構：從文字菁英到在地實踐者

在主流的觀念史／概念史研究中，觀念／概念常被視為源自於經典文本、哲學論述或政治語言的抽象建構。然而，臺灣原住民族的知識體系並不依賴書寫文本，而是透過口傳記憶、土地實踐、身體儀式與語言日常持續地形構其觀念／概念世界。這代表觀念／概念並非只能透過文字「被保存」，更可以在生活實踐中「被再

生」。舉例來說，阿美族太巴塢部落對地景的命名、空間禁忌的遵守、祭儀中的倫理關係佈置，皆構成一套具有邏輯性與歷史深度的觀念體系，其內容涉及人與自然的關係、祖靈秩序與社群共構等，足以與主流倫理政治觀念相互對話。

2. 觀念／概念載體的去中心化：從文本邏輯到多模態實踐

臺灣原住民知識體系的特質之一是其多模態（multi-modal）特性，所以觀念／概念可以被歌謠承載、被舞蹈傳遞、被地名記憶，也可以透過空間實踐與植物分類體系中具體體現。這種形式挑戰了傳統觀念史／概念史預設的概念及抽象詞彙的等同關係。

換言之，原住民觀念／概念的生成場域，並非只存在於文學或哲學文本中，而是在祭儀場地的布置、土地耕作的時序、部落內部空間使用的倫理邏輯中，呈現為一種以生活為基礎的知識哲學。

3. 觀念史／概念史方法的拓展：從詞彙考古到實踐民族誌

若觀念／概念的載體不限於文字，那麼觀念史／概念史的研究方法也必須相應調整。對臺灣原住民觀念／概念實踐的理解，不可僅止於語意分析或詞源溯源，而需透過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深描民族誌（deep ethnography）與詮釋人類學方法進行實地理解。²⁶

這些方法允許研究者進入部落生活世界中，追蹤觀念／概念如何在日常對話、儀式行動與土地關係中被創造、維持與轉化。原住民知識體系不僅提供「另一種觀念／概念」的內容，更提供「如何思考觀念／概念」的另類形式，從而讓觀念史／概念史不再是中心權力的歷史書寫，而是多元實踐之間的對話場域。

²⁶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5-6.

所以將臺灣原住民知識體系納入東亞觀念史／概念史視野，是對觀念／概念本體、觀念／概念生成條件與觀念史／概念史方法的三重挑戰與擴展。這種介入不僅補足主流知識敘事中的缺席，也引導我們重新思考知識世界的多樣性與正當性。

三、剖析太巴塌空間慣習核心觀念

阿美族語中對「濕地」（wetlands）、「中心」（center）與「邊界」（boundary）具有空間慣習的詞彙與實踐，有其特有的地景觀念、語言結構與社會空間實踐的理解。這些空間觀念並非單一抽象詞彙的對應翻譯，而是根植於生態知識、儀式秩序與族群認同的實作性語言表達方式中。

（一）阿美族語中的空間詞彙

1. 濕地：*sironironay* 與地景知識的語義厚度

在阿美族太巴塌部落，*sironironay* 指稱低溼濕地、潮濕沼澤的古地名。此詞源意指潮濕及泥濘之處，加上帶有強化、描述性地形的語義特徵。這種複合構詞不僅描繪了地形特徵，更內含族群對該地景的感知、記憶與歷史層次。

在實踐層面，*sironironay* 並非單純的地理空間，而是一個與漁撈、採集、季節移動與祖靈傳說密切交織的場域。例如，老一輩族人提及的 *fitonay to sironironay*，意為「有刺竹林延伸至濕地邊緣」，該表述將生態特徵（竹林、濕地）與歷史實踐（採集、狩獵）結合，體現濕地作為資源場域與歷史行動舞臺的雙重屬性。因此，濕地在阿美族語中，不只是自然地貌，更是社會地景與記憶地圖的一部分，具有「記憶性的地名」（toponymic memory）功能。

2. 中心：*terong* 作為聚落核心與祖靈秩序

「中心」在阿美族語中可表達為 *terong*，此詞常被用來指稱村落的聚焦處：傳統男子集會所或祭儀場域所在地，也可指稱祭典儀式中權力與關係交織的「中心點」。*terong* 並非純粹幾何或空間意義的「中間」，而是指涉社會秩序的起點與祖靈連結的軸心。因為在太巴塌部落的空間慣習，是以 *sironironay*（舊沼澤）為 *terong*，當部落圍舞時長老、青年組織、歌隊皆以此為核心，並且圍繞其進行動作排布。因此，*terong* 的概念同時具備空間與權力意涵，也是一種結構中心與象徵中心的疊合。

3. 邊界：*lilis* 與空間禁忌的設置

「邊界」在阿美族語中常以 *lilis* 或相關詞根 *lawac* 來表示，意涵為「邊緣、盡頭、分界」。此詞條既可指地理的界限，像是部落之間的分界林，也可表達社會規範與禁忌的界線，意謂不可越過那片山林的邊界，此類句法體現空間同時為自然地景與倫理秩序的場域。

此外，邊界也與祖靈地與異族空間相連。部分地區的 *lilis* 被視為不宜逗留之地，反映出阿美族對於空間的分層觀，以及不同空間的社會意義。這些邊界往往不是以固定座標劃定，而是透過故事、狩獵規範與儀式記憶傳承。²⁷

4. 語言、空間與實踐的交織：空間詞彙作為文化分類工具

在阿美語中，「濕地」、「中心」、「邊界」的詞彙並不是孤立存在，而是與地名系統、方位詞、時間詞等交織，形成一種語言、空間、社會實踐的三重關係網絡。這種語言結構不僅分類自然，也構成部落內部對於空間倫理的認知秩序。空間在語言中被分

²⁷ 原英子著，黃宣衛主編，黃淑芬、江惠英、林青妹編譯：《台灣阿美族宗教世界》（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5年），頁101-141。

類、記憶、禁制，也在實踐中被再生、儀式化與社群化。因此阿美族語中的空間詞彙是一種活的知識系統，也是一種嵌入於文化實踐與地景記憶之中的語義系統。它們既反映族群如何理解土地與世界，也展現出空間如何成為道德、歷史與政治實踐的基礎場域。

（二）透過歌謠與口傳歷史構建空間記憶

太巴塌部落的語境中，*saksakay* 作為一個描述發祥地的傳統地名，不僅指涉具體地貌，更承載著祖靈記憶、生態實踐與群體遷移的歷史意識。然而，自日治時期起，該區域逐步被納入日本殖民地政體系，其傳統地名或遭到音譯轉寫，反映出一種將地方感去歷史化、標準化的知識治理策略。²⁸

1. 命名套層促使阿美族空間慣習符號削弱

命名套層，意謂地名的觀念替換在語言表層之下，構成對於原住民族地景認知與文化記憶的結構性遮蔽，因此語言與地圖的命名套層（naming overlay），正是東亞觀念史／概念史中「空間知識的殖民性重組」必須關注的一項重要課題。

由於傳統阿美語地名體系是以生態感知、神話敘事與集體記憶為核心，具有流動性與實踐導向，但當這套知識邏輯被置換為日語地政體系中的固定化名目時，便出現了一種可譯與不可譯的文化斷裂。所以地名不只是語詞，更是社群在空間中建立關係、敘述歷史的「語言儀式」。當地圖中無法辨識邊緣符號時，其作為文化核心的功能自然也被悄然削弱。

²⁸ 顧恒湛：《再殖民、地緣政治與抵抗：戰後臺灣原住民族形塑之研究（1945~198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9年6月），頁1-15。

因此，回返地名本源，從語義、地景與族群實踐三方面重新解讀阿美族的觀念史／概念史，不單僅是地名復振的文化行動，也為東亞觀念史／概念史補上原住民族觀念／概念生成的缺席篇章。

2. 空間作為記憶載體：祖靈、儀式與身體行動

太巴塢部落在日常生活與儀式中重複的空間行動（如祭儀路線、家屋朝向布局），通過身體實踐將「秩序」「正當性」等觀念內化為「理所當然」的行為邏輯，這種空間慣習與儒家宗法制度下的空間秩序形成文化對照，體現不同文明對空間倫理的建構差異。

（三）歷史交會與觀念／概念轉化：殖民與現代化之下的空間語義變動

1. 命名政治與殖民語言學：日治時期的空間改造與地名制度²⁹

傳統地名如何被日語命名取代所壓覆並消滅記憶（suppress and destroy it）的影響，³⁰是一個極具啟發性的問題，因為牽涉到語言、帝國權力與知識體系之間不同元素的歷史糾葛。然而就東亞觀念史／概念史的視角來論述，不僅是地理指涉系統的一部分，更是知識與權力共構的產物。特別是在近代帝國擴張與殖民統治的語

²⁹ 洪致文、馮維義：〈清末以來臺北盆地歷史地名的空間認知相對方位改變〉，《環境與世界》第28-29期（2014年6月），頁75-96。

³⁰ Pierre Nora,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Spring 1989): 9. 本文對應原文頁9，以「記憶疊加」之概念借鑒該文（superimposition）內涵。Pierre Nora比較「記憶」（小記憶）與「歷史」（大歷史），指出現代歷史學的核心邏輯不僅是批判性的分析，還具有「壓制並消滅記憶」（語境中雖為壓制和摧毀之意，但實質上卻是「小」記憶壓覆在「大」歷史之下）。由於「歷史化」形成新的象徵層次的「壓覆」，因此「壓覆」在本文係指殖民權力通過地名替換對原住民族地景認知的結構性遮蔽，導致傳統語義與文化記憶斷裂。

境中，傳統地名常常成為國家命名體制重構的對象，其過程不僅是語言替代，更是觀念／概念與空間治理邏輯的套層。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對於東部的土地政策，基於地廣人稀、總督府移住政策，以及為便於日本內地移民的土地取得，因而介入原住民族原有的土地慣習以及土地所有權。諸如「一般調查」所涉入原住民族的空間而進行地籍測量，這些做法將原住民族語地名，轉寫為日語音或改為日式漢字名稱，因此「一般調查」亦被族人稱之為「土地整理」；然而「土地整理」對於阿美族語境而言，實則為改變「土地名義」的外部壓迫，這種內外不同之差異，投射於總督府在東部平野辦理移民適地調查（1908年）、建立大和民族模範村（1909年）、花蓮港廳管內土地整理（1909年）等名義，³¹旨在調整地方行政區劃，將傳統聚落與地名重新命名與整編，將既有的原住民地域名義加以日語化，不僅音譯、義譯，甚至重新命名，以配合殖民地治理與地圖編製的標準化需求。這些形式限制了原住民族原有燒墾、輪耕、漁獵與狩獵慣習，不僅反映帝國對土地的實質掌控，更建立一種知識上的空間主權，將在地記憶、語義與生態關係封存於不可見的歷史層的語境抵抗當中。

原住民族的地名承載的不只是位置資訊，而是一整套與自然環境、歷史事件與祖靈系譜緊密相連的敘事網絡。然而，這些地名在殖民知識編碼下被「可譯化」、「可標準化」，成為殖民政府地政系統中的對應符號，致使原有的文化語義層被壓抑甚至抹除。³²這正是觀念史／概念史研究中的知識套層現象：新殖民知識系統覆蓋舊有地方知識，使其轉化為帝國可計量、可治理的空間單位。即便原住民族從空間歷史記憶而言，被更名的地景仍在族人語言與敘事中活著，但其存續的條件是反覆的言說與實踐。

³¹ 李文良：〈林野整理事業與東台灣土地所有權之成立型態（1910-1925）〉，《東台灣研究》第2期（1997年12月），頁169-196。

³² 林慧君：〈臺灣日治時期地名變更小考——從日語觀點來看〉，頁141-156。

地名的遺忘不在於地貌的消失，而在於命名語言與日常實踐之間關係的中斷。James Scott (1936-2024) 對於隱微語言實踐的探討、³³Pierre Bourdieu (1930-2002) 對於「慣習」與語言實踐的互動分析、³⁴Anthony Giddens對於結構化理論中的語言與行動互構之論述，³⁵皆說明了地名作為社會實踐的一環，其符號意涵需透過生活實踐持續維繫。當命名實踐斷裂，地名便可能失去與地方生活的連結，進而被遺忘。相對於實踐與符號的討論中不斷闡述「慣習」如何透過生活來實踐形塑世界，若命名習慣與語言實踐斷裂，地名便可能失去與生活者的連結，漸而被人們遺忘；地名的口語命名習慣的停止，可能導致地名概念與族群中互動實踐中斷。

日治時期，原住民族被迫處於二語並用的語境中，³⁶地名的更替並非單純的語言事件，而是東亞現代性歷程中，帝國語言學與地理知識制度交織之下的「概念治理」(conceptual governance) 表現。地名的日語化與知識套層現象，體現出東亞觀念史／概念史中對地方感(sense of place)、族群知識與語言權力的深刻重組。

³³ Scott,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45. 文中 Scott 闡明權力關係下的符號與語言實踐如何被邊緣化。儘管焦點在抵抗語言，但他提及語言與實踐密切相關，若實踐被剝奪，象徵與命名也會失效，符合「命名語言與生活世界的中斷」。

³⁴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2013), 99, 159-197. Bourdieu 強調語言與行動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社會空間中重複實踐所內化的體系，若語言命名習慣（如地名）失去實踐的根基，其社會意義也會中斷與淡化。

³⁵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25-40. Giddens提出「結構化理論」，說明結構與行動之間的互動。語言（如地名）不是單向命名，而是在反覆的社會實踐中得以再製。地名若失去被使用與再製的機會，就會失去社會意義。

³⁶ 安藤敏朗：〈植民地と「パイリンガリズム」——安藤正次と台湾〉，收於山路勝彦、田中雅一編著：《植民地主義と人類学》（兵庫県西宮市：關西學院大学出版会，2002年），頁172-175。

2. 傳統地名如何被日語命名套層取代與語意重劃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自 1895 年起開始進行臺灣全島地名調查與編纂，其目的不僅是為了地政與行政管理，更是透過語言統整來實踐「空間治理」（spatial governance）的策略。阿美族傳統地名在日治時期經歷「命名套層」、³⁷「語意重劃」（semantic reterritorialization）的歷程，³⁸以下特別聚焦於語言、權力與空間記憶之間的交互作用，突出作為歷史語言學與空間知識變遷的論述主軸，以凸顯阿美族傳統地名的命名套層與語意重劃，及殖民語言治理的空間實作，在殖民語境下，傳統地名不僅面臨語言轉換，更經歷了語意的「重劃」與記憶體系的「遮蔽」。

太巴塢部落改造地名的歷史背景，源自於昭和七年（1932）年，由鳳林郡測繪所派遣田村工夫、宙川、福永屈，三位日籍技正合力完成太巴塢部落的地形測量工作，當時計完成 23 幅地圖測量工作。這些測量圖使用高精度的 1/500 比例尺，來進行地籍調查與空間規劃。³⁹透過這類精確測量，日本政府得以掌握原住民族的土地使用狀況、人口分布與族群聚落的空間配置，可再進一步為稅收、土地徵收、基礎建設乃至於軍事部署提供制度化依據。此類高比例尺地圖的產製，實質上並非單純出於技術性的需求，而是深刻反映了殖民統治下，對空間的控制慾望。特別是在太巴塢部落，這

³⁷ Scott,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9-46. 「命名套層」概念結合薩伊德「東方主義」與 Scott 「隱形文本」理論，前者揭示殖民知識建構的權力機制，後者則闡釋邊緣群體的抵抗策略。

³⁸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1-45;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81-90. 參考自劉禾「跨語際實踐」與傅柯「知識考古學」，強調殖民語境下語義重構的權力博弈。

³⁹ 參光復鄉戶政事務所：〈日治時期測太巴塢部落地形測繪檔案圖〉第 1-24 圖（1932 年測繪），見鳳林鎮公所：《日治時期太巴塢部落測量地圖集 1-26 圖》（花蓮縣光復鄉：東北社區發展協會，調圖日期：2020 年 7 月 28 日）。

類測量行動往往與「理蕃政策」密切結合。所以這些地圖不僅記錄了自然地形與人為設施，更透過空間再分類與再命名，改造了原住民對地景的認知，使其原有的空間記憶遭到削弱或替代。因此地圖製作因而不只是視覺技術，而是一種知識治理的實踐工具，日本政府不僅為土地測量與建設規劃提供基礎，更深刻地揭示了空間知識如何成為國家殖民治理的延伸手段。這些地圖重塑了原住民社會的地景、空間使用與認同邊界，至今仍可見其歷史痕跡深植於部落地名、交通網絡與土地權屬之中。

3. 從音譯到日語化「可譯」語言的命名重構

許多阿美族語的地名被日治官員以音譯形式登錄，然而音譯並非中立的語言轉換，而是以日語音節系統重編部落自我命名，逐漸導致其語音系統與原有語義疏離（semantic disembedding）現象。⁴⁰在這種過程中，原有地名中指涉自然地景或祖靈記憶的詞根將逐漸模糊，例如：在太巴塿部落，*cilitahan* 並不僅是地名的稱呼，由於米糠或稻殼混和泥土的作法，是阿美族傳統農業與建築中「開發新境」的做法。*cilitahan* 具有以下的主要用途與意義：

其一，稻殼可以改善土壤結構，避免沼澤土壤過於黏重不利於行：

我們使用稻殼或米糠加入泥土中，可以減少土質乾裂，這對於地區在夏天時農作具有相當的保濕功能（林福喜2022年8月13日口述）。⁴¹

⁴⁰ Ekkehard König and Peter Siemund, "Intensifiers as Targets and Sources of Semantic Change," in *Historical Semantics and Cognition*, eds. Peter Koch and Andreas Blank (Berlin: Mouton, 1999), 237-257. Ekkehard König與Peter Siemund研究語義變化的歷程，認為語義變化絕非無規律或隨機，受到時間與空間的影響，它具有普遍性和一定的規律性。所以本文「語義疏離」可被理解為語詞原始意義，逐漸偏離或淡化或喪失原始語義的過程，隨著環境變化而逐漸遠離原始意涵，從而與新語義之間距離加大。

⁴¹ 林福喜耆老口述：「過去太巴塿部落曾經在沼澤使用米糠或稻殼，改善濕地土質利於耕作與居住」。本段訪談內容係筆者於2022年8月13日在太

其二、米糠的有機質可促進沼澤微生物活動，有助於圖壤肥化利於耕作：

我們祖先經常利用米糠來堆肥發酵，或利用米糠混和泥土來保護植物的根系的生長（孫聖雄2022年8月14日口述）。⁴²

基於以上的二個因素，*cilitahan*在空間發展的意義上，是一種除了仰賴人類對於空間的需求之外，更具體表現了阿美族利用、耗費自然物質，來營造人類生存價值的慣習，說明該處是先人有計畫性地對於舊沼澤的地理環境進行生態改善，從而開發成為部落的一個部分。目前該處已由無人居住的沼澤區，逐漸演變為一個具備生活機能的現代化農村，我們只能從空間的流變性，來找尋它過去的歷史意義。

(1) 從意譯到再命名「不可譯」空間的殖民與重劃

cilitahan 原指稻穀飛舞之處，卻在地圖上被登記為音譯後的「西富村」或「北富村」，其文化語境不再為後人所理解。這種命名行為是一種「地名的脫離語境化」（de-contextualization of place names）的事實，⁴³當地名失去其原語系統與敘事功能，就如同將空間記憶凍結在一張非族群視角的地圖中。

巴壠部落禮勞區家訪的田野調查筆記。林榮康：〈太巴壠部落空間慣習調查訪談紀錄〉（太巴壠部落禮勞區：林福喜口述，2022年8月13日）。

⁴² 孫勝雄耆老口述：「使用過米糠來改良土質沃度，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維護植物根部生長；孫聖雄耆老也提出有些族人在光復後整治農地中，經常發現前人在農地下方有稻炭（下）與稻穀（上）鋪陳遺留的情形」。本段訪談內容係筆者於2022年8月14日在太巴壠砂勞部落進行家訪的田野調查筆記。林榮康：〈太巴壠部落空間慣習調查訪談紀錄〉（太巴壠砂勞部落：孫勝雄口述，2022年8月14日）。

⁴³ Carolyn Culbertson, *Words Underway: Continent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2019), 1-3. 作者認為語言讓我們感受到自己的本性，這也可能成為疏離的來源，因此面對無意的含義，超出我們控制的持續存在，儘管我們真心努力去傾聽，卻覺得無法做到完全理解。即本文所強調語言疏離感，或語言的去脈絡化。

(2) 命名套層的後果造成空間與語言記憶斷裂與實踐邊緣化

由於地理名稱在語境中是語言記憶的節點，也是族群實踐的空間標記，在命名套層過程中，阿美族人雖持續以母語使用傳統地名，然而國家系統中的學校、戶政、地圖、郵政則全面採用第二語言或後繼的中文命名。族語地名被迫退居地方記憶，成為家庭或祭儀中才可能重述的內容，也造成世代間對空間記憶的理解落差，以及語言記憶的斷裂與實踐的邊緣化。

(3) 命名的知識政治與觀念史／概念史的位置

阿美族語地名的重劃不只是語言替換，更是一種以語言為工具的殖民知識治理。這些命名套層構成東亞觀念史／概念史中極具代表性的案例，從而產生原生觀念／概念的邊緣化與帝國語言的中心化，並透過地圖、教科書、戶政資料的反覆實作，使觀念／概念的生成場域從部落語境轉移至帝國語境。

4. 阿美族人透過歌謠與語言教學進行文化知識的在地化

蔴籟瑪里谷·嘎荳以“*O Niyaro'no Tafalong*”這首部落歌謠傳唱太巴塢部落的傳統地名，不僅記錄語詞與地景對應關係，更藉由聲音與儀式再現，使得地名成為文化實踐與記憶的「活場域」，此種語言實踐反映出在日治時期原有地名被以音譯或意譯形式替換。

相較於殖民政權以行政便利與視覺邏輯為基礎進行命名，原住民地名體現的是功能性、神話性與族群記憶的混成語意。這些命名不只是詞彙，更是族群與自然環境互動的歷史結晶。當地名從語音轉譯到語意遮蔽，再進一步進入「命名套層」的階段，族群的空間主體性亦逐步被排除於官方地圖與歷史文件之外。

誠如蔴籟瑪里谷·嘎荳所展現的，歌謠與民族史提供了一種抵抗語境的策略，使得命名行為不再只是「他者的命名」，而是「自我命名的持續行動」；「如何以語言和地景重新編寫空間秩序？」這正是東亞觀念史／概念史中，亟需從邊陲地帶導入、補遺的觀念

之一。這些行動的歷史背景，來自於1945年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所推行的現代化政策與教育體制，其對於阿美族的空間慣習，造成了現代化與教育轉譯的深遠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面向：

(1) 空間語彙的「國語化」與標準化重編

當國民政府的行政整編過程中，原本由部落成員以阿美語命名的地方空間逐漸被中文漢字名稱取代，這些地名轉譯並非單純的語音音譯，而是依據中國文化的語義邏輯重新命名。例如具有特定生態或神話意涵的地名，以太巴塢部落為例：*Fahol*、*Kosian* 等具有族語地景敘事與功能記憶的地名，在日治與戰後國民政府時期逐漸被替換為行政用語，如光豐路、建國路等。這種命名套層的過程，使族人原有的空間記憶與文化意義被制度化命名所消解，但同時也激發出文化主體透過歌謠、敘事與教育進行地名再記憶的運動。此類命名政策，不僅是語言轉換的問題，更是一種地景記憶的重寫與文化權力的再分配，導致原有的空間慣習被納入漢語邏輯所主導的國家地理系統。

(2) 傳統地景知識的邊緣化與實作斷裂

國民政府主導的土地制度改革、公共建設與區域規劃，經常忽視部落在地的空間使用方式。例如山區開發與農耕重劃計畫（如山坡地利用整治），強制改變了傳統的水域輪作、濕地共用與祭儀使用空間，使許多阿美族空間慣習如季節性採集、共享儀式地點逐漸喪失實踐場域。

傳統地名背後所蘊含的功能性空間，如 *cekingan* 表示漁撈地、*kosian* 為祭祀鐵神之處，然而在現代土地登記與開發邏輯中卻無法被識別。所以此舉，更進一步導致傳統知識與空間記憶從「地圖上消失」。

(3) 教育語言政策與空間概念的轉譯

國民政府以推動「國語教育」為核心國家語言政策，全面禁止原住民民族語在學校教育中使用，並強調現代地理、國土認同與中國歷史地理教育。這種語言教育轉譯的過程，使得下一代阿美族人逐漸失去以母語理解與描述空間的能力，也造成對傳統地景的認知斷裂。

這些斷裂面造成傳統以地名承載歷史、神話與族群記憶的語言系統，被現代教育體系以抽象化的「座標、地圖、國土」的觀念／概念取代，從而削弱了原民空間慣習的敘事力與教化功能。最後國民政府推動的現代化治理與國民教育，雖以現代國家建設為名，實則對阿美族空間慣習構成了深層的文化壓迫與知識殖民。在地名的替換、地景功能的消失與語言傳承的中斷之中，空間成為原住民族文化認同受到侵蝕的重要戰場。唯有透過重新挖掘部落的空間敘事、恢復語言命名權，方能抵抗這種現代性底下的空間遺忘。

四、太巴塋空間慣習的研究回顧

太巴塋部落，作為阿美族東部山海交會地帶的重要部落之一，其空間慣習體現了族人對土地、歷史與社會關係的深層理解。這些空間實作並非僅限於物理場域的劃分，而是與祖靈信仰、氏族制度、世代記憶與儀式實踐交織而成的一套文化邏輯。

透過深度的田野調查我們可發現，部落空間並不是被單一地規範與使用，而是因應時間、事件與社會關係，具有高度彈性與多重意涵的「動態場域」。空間慣習的研究涉及部落的土地使用、社會結構、文化傳承與自然環境的互動等議題。以下是一些與太巴塋部落及其空間慣習相關的研究，這些研究對理解部落空間使用和文化認同有重要貢獻。

（一）部落空間與土地使用

太巴塢部落在學術研究中，其「部落空間」與「土地使用」的定義常常緊扣在地的社會文化脈絡與族群知識體系中進行理解。以下是綜合學術文獻所整理出的學術性定義：

1. 「部落空間」的定義

「部落空間」係指太巴塢部落依據阿美族傳統社會組織、親屬制度與文化儀式所構築出的生活與象徵空間，涵蓋聚落住宅、祭儀場所、耕地、山林與河域等，具有功能性與文化意涵的複合地景。然而土地使用並非單純的經濟行為，而是包含文化記憶、權力關係與社會互動的系統。在太巴塢部落的脈絡中，「部落空間」不僅是物理地理上的聚落或建築分布，更是族群文化、社會結構與儀式實踐的場域。它具有以下幾項特徵：空間安排依循親屬群體（如氏族）與年齡階級制度；各類空間具備象徵性（如祖靈地、祭場）與實用性（如農地、狩獵區）；空間的使用權與進入權通常由部落集體共識決定，並內嵌於日常生活與傳統知識之中。

2. 「土地使用」的定義

部落空間是一種「活的文化地景」，其劃分與使用受到部落儀式與社會規範的深刻影響。然而「土地使用」指的是太巴塢部落依據部落慣習與知識體系所進行的土地配置、利用與管理行為，涵蓋農作、狩獵、居住、祭儀等活動，並以部落的社會規範與倫理作為調節機制。⁴⁴太巴塢部落的「土地使用」在學術上常被視為一種

⁴⁴ Carl Sauer,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Geography* 2 (2008): 315-321. Carl Sauer 的「景觀形態學」理論，旨在分析太巴塢部落土地使用中自然生態（如濕地、耕地）與文化記憶（如地名、儀式）的交織關係，揭示土地作為「文化景觀」的多重意義。

具有文化治理特性的空間實踐，它不同於現代法律下的私人產權制度，而是一種集體共享、具儀式性與世代傳承特質的土地制度。

部落儀式空間同時也是部落土地系統的一部分，承載部落成員的身分認同與祖靈信仰，其具有以下特徵：土地屬於部落或家族的集體資產，使用權非絕對個人化；使用方式具有季節性與儀式性，例如配合播種、收穫或祭祖儀式；土地使用與祖靈信仰、自然觀有密切連結，強調土地與人之間的倫理關係（土地為祖靈之所依）；土地管理具備社會制裁功能，違反禁忌者會被排除使用權。

(1) 土地的集體性使用

在阿美族的傳統社會中，土地不僅是生產資源，也承載了部落的集體記憶和文化價值。太巴塢部落 *saksakay* 遺址，與太巴塢部落的土地利用慣習，常常與家族和部落的社會結構密切相關。傳統祭祀活動在 *saksakay* 遺址，⁴⁵ 體現部落對土地與資源的集體管理與文化規範，這反映出原住民社會對自然資源的尊重與制度化管理與使用管理的內涵。

本單元從太巴塢部落空間表徵詮釋，⁴⁶ 將太巴塢部落的空間治理與民俗意義，透過片假名手抄本的翻譯與古語詮釋，探討部落空間如何承載族群文化與歷史記憶，並強調部落空間的再現與治理經驗，對於太巴塢部落集體社會的動態過程有深入的註解。

⁴⁵ 林榮康：〈太巴塢部落 *saksakai* 遺址家屋研究〉，發表於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主辦：「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2021年會」（2021年9月25-26日），頁1-27。*saksakay* 遺址位於太巴塢落東富村的文化發祥地，是一個完整的聚落遺址，內有大量打磨石器、陶片等考古遺留，過去是祭司家族祭祀用地。

⁴⁶ 林榮康：〈太巴塢部落空間表徵我族詮釋之研究彙整與回顧〉，《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第27期（2020年6月），頁121-156。

除空間表徵的文化詮釋外，太巴塢部落的土地實踐亦涉及轉型正義議題。日本時代的土地制度不僅改變社會結構，更通過地籍登記瓦解傳統土地倫理政治、宗教與社會功能。

太巴塢部落作為臺灣東部歷史悠久的原住民族社群，其土地使用制度長期以來建立在集體共享、親族協作與口述規範之上。然而，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劇，包括法制土地登記、農業資本主義擴張、基礎建設介入及教育就業結構的變遷，部落原有的土地集體使用慣習，正面臨現代化進程對太巴塢部落土地集體使用制度之內部影響，已流變成爲不同程度的挑戰與轉型。其土地使用制度，長期建立在氏族與家屋體系之上的集體慣習邏輯，需更進一步反思「土地」作為文化與權力場域，在當代的再生與困境中端限於現代化與國家法制體系逐步進入部落的過程，傳統土地制度正面臨多重挑戰與重組，包括土地登記政策所帶來的產權私有化趨勢、勞動形態與農耕文化的改變、部落青年遷移與世代斷裂現象，以及市場邏輯滲透下對土地價值的重新理解。

(2) 土地與資源的儀式性管理

通過儀式性活動來管理土地和自然資源，特別是在農耕、狩獵等活動中，部落的空間慣習往往包含了對自然環境的尊重和管理，而具有深厚的儀式性與文化性意涵。太巴塢部落捕魚文化中的集團捕魚，⁴⁷俗稱 *parakarang* 或 *parakar'rakar*，是一種阿美族較為古老捕魚的傳統文化之一，其特殊性表現於社會集體性的捕魚活動，目前由於傳統空間的改變，已不復見於阿美族的文化主體當中。然而 *parakar'rakar* 一詞來自於集團捕魚裝置魚具的名稱，做為等候魚獲收口的古語，同時也是阿美族對於大自然共同分享的文化表現

⁴⁷ 高進福：《一個Mifuting的休閒空間～以中興部落集團捕魚為例～》（屏東：美和科技大學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23年1月），頁7-13。

之一。集團捕魚這件事在族群文化的認同過程中，具備了典型「原生」（primordial）的概念，致使族群內部產生高度凝聚力或文化歸屬感，這種關係伴隨著田野主體成員在「濡化」的過程中，透過社會情感內化的過程，建構在田野主體的空間慣習上，做為土地資源儀式化具體實踐的表現。

（二）部落空間的象徵與文化認同

1. 空間與部落認同的構建

部落的空間結構（聚落、田地、祭場等），不僅是實際的生活空間，也是一種文化象徵，代表著部落的歷史、傳統與身分認同。太巴塌部落的空間與認同構建是臺灣民族學界相當關注的議題，特別涉及家屋、地景、氏族領域與儀式性空間等層面，這些構成了部落認同的空間實踐與象徵表達。⁴⁸

太巴塌的社會結構透過空間，如家屋、氏族領域與部落集體領域來實踐與維繫。不僅是物理上的劃分，更具備祖靈連結、權威分配與社會秩序的象徵意涵。⁴⁹此外，從歷史地景的角度切入，主張太巴塌的空間承載了豐富的祖先記憶與族群敘事。也透過對特定地點命名、使用與傳說的分析，展示了空間如何轉化為部落集體記憶與文化認同的載體。隨著世代變遷與青年外流，這些地景記憶面臨傳承危機，反映出部落空間認同機制在現代社會中的斷裂與重構困境。⁵⁰

⁴⁸ Namoh Nofu Pacidal：〈Kakitaan資源利用制度儀式與礦權：太巴塌社為例〉，《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第8卷第1期（2018年3月），頁173-190。

⁴⁹ Namoh Nofu Pacidal：〈不恥下問的諮商同意權起於自決不足的FPIC〉，《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第8卷第2期（2018年6月），頁97-115。

⁵⁰ 那莫·諾虎：〈Ka-kita-an我們之處，非「部落主義」的我群觀〉，《新社會政策雙月刊》第49期（2017年2月），頁26-31。

綜上，太巴塋部落的空間實踐兼具居住生產、文化認同與權力建構功能。當現代土地制度衝擊傳統使用方式時，部落通過儀式復振與空間重構（祭場重建、地名傳唱）維繫集體認同，形成傳統與現代的張力對話。

2. 空間與儀式的結合

太巴塋部落的空間慣習中，與社會儀式相關的空間配置（祭場、祖靈祠、家屋朝向等）不僅承載實用功能，更深刻映射部落的社會結構與文化秩序。空間在此並非中性的場域，而是儀式實踐與文化意義不斷被展演與再生的結構媒介。在年齡階層祭儀或祖靈祭典等關鍵儀式中，特定的空間布局、動線安排與家族站位，明確反映出家族序列、年齡角色與集體邊界的象徵邏輯。這些空間分布與使用方式，構成一種具體而複雜的文化語法，並在儀式展演中被不斷重申與活化。

阿美族的空間觀強調地景與祖靈、歷史記憶的連結。太巴塋部落中許多儀式場域往往對應傳說地點、遷徙軌跡或神話敘事，使空間不僅是物理實體，更是族群集體認知與情感連結的核心。從結構主義的視角觀之，部落的家屋、青年會所與公共祭場三者構成一個象徵性的空間系統，透過儀式行動將性別、年齡與社會權力結構以具身方式實踐於空間之中。這些結構不僅規訓個體行動，也形塑群體的文化認同與社會秩序。

綜合而言，太巴塋部落的空間配置與儀式實踐密不可分，兩者互構出一套穩定而動態的文化機制，使部落成員得以在具體空間實作中延續對土地、祖靈與社群的歸屬感。本文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現代國家制度與社會變遷如何挑戰這一儀式性空間系統，並分析部落如何透過調整與創新實踐回應這些變動。

（三）現代化與空間慣習的變遷

本單元擬從部落空間慣習的角度出發，補足現有研究中對於地方行動與文化實踐的不足，並進一步理解阿美族部落如何在多重制度與文化變遷之間，發展出具有延續性與創造性的空間策略。

1. 土地變遷與部落適應

原住民族與土地之間的關係，歷來是民族誌研究的核心議題之一。然而，對多數原住民族而言，土地不僅僅是生計資源的提供者，更承載著族群歷史記憶、祖靈信仰與文化實踐的深層意涵。土地作為社會關係與宇宙觀的延伸，其價值遠超過主流社會所界定的物權概念。在太巴塢部落這一阿美族傳統社會中，土地被視為祖靈與人類共構的空間，透過農耕、祭儀、口傳歷史與地景命名等形式，部落成員維繫著對土地的深厚情感與認同。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展，太巴塢部落的空間慣習經歷了明顯的變遷。自日治時期開始推行的地政登記、土地分類及村落重劃政策，至戰後國民政府實施的保留地制度與基礎建設徵用，部落的傳統領域逐步被切割重構，使得原有的土地使用邏輯與文化空間配置遭受重大衝擊。這類國家治理模式，建立在一套以書面登記與劃界為基礎的土地所有權體系，與原住民族以傳統領域、共享權利與口述知識為基礎的土地理解，存在根本性的差異與張力。

儘管面對政策與法制的干預，⁵¹太巴塢部落展現出強韌的文化適應與再生能力。部落內部透過重建祖靈祭儀、恢復耆老領導制度與儀式權威，重新連結土地與文化記憶，形塑具內部共識的空間秩序。同時，地方知識的傳承，如對特定地景的命名、歷史故事的敘

⁵¹ 顏愛靜、陳亭伊：〈原住民族土地制度變遷及課題與對策之研析〉，《台灣原住民研究學報》第2卷第2期（2012年6月），頁1-25。

說與土地使用的倫理規範，亦持續在部落日常生活中被實踐，成為面對土地變遷的重要文化資源。

近年來，部落青年積極參與口述歷史的整理與地景知識的記錄工作，這不僅是回應土地流失的文化行動，也是一種知識主體性的實踐。配合《原住民族基本法》、地籍調查、傳統領域劃設等制度資源，太巴塌部落逐漸發展出兼具文化根基與制度操作的土地主張策略，呈現傳統知識與現代工具交織的新形式。

然而，目前針對太巴塌部落土地變遷的研究，多集中於歷史地理與法制結構的層面，對於部落居民如何在日常空間實踐中持續建構土地認同、以及如何將空間轉化為文化主體性的載體，相關討論仍屬稀少。未來研究若能更深入探討這些文化實踐的內在邏輯與轉化機制，將有助於理解原住民族如何在結構性限制下，透過「地方化」的實踐形塑自主的空間治理模式。

2. 社會結構與空間安排的轉變

太巴塌部落作為阿美族最具代表性的傳統社會之一，其社會組織呈現出明顯的年齡階層與性別分工特徵。⁵²部落空間的安排，並非單純基於地形與實用性，而是深度嵌入年齡階級制度、家族位置以及祭儀空間（祭場）等社會文化結構之中。早期民族誌研究多著重年齡階級制度的社會功能，視其為部落集體記憶、代間責任與社會連帶的重要基礎，並透過儀式與空間配置進行社會化與身分認同的再製。

然而，隨著日治時期與戰後國民政府推動地政制度與聚落重劃，部落原有的空間結構與社會邏輯開始受到制度性干預。住宅排列、祭場位置及公共活動場域等空間元素在新的土地編制中被重新

⁵² 黃應貴：〈導論——空間、力與社會〉，收於黃應貴主編：《空間、力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年），頁1-37。

定義，使得傳統空間慣習逐漸解構。儘管如此，部落並非被動接受這些變遷，而是展現出文化「重組性」的空間實踐。即便祭儀空間遭遇壓縮與遷移，族人仍透過象徵性標誌與儀式重演，積極維繫空間記憶與文化秩序。

現代建築形式與經濟模式的引入，也促使傳統家屋空間與親屬聚居模式轉變為核家庭化與居住分散，導致部落空間逐步從文化共同體轉向政治治理與認同展示的場域。2024年太巴塋部落興建的文化館與活動中心，除因應現代行政體制需求外，也成為凝聚社會連帶、重建內部秩序的重要象徵空間。

整體而言，太巴塋部落的空間安排與社會結構在殖民治理、現代政策與部落內部文化調適的交織下，逐步形塑出一套具延續性亦具變異性的文化地景。然目前學界多聚焦制度與歷史描述，對於部落如何透過日常空間實踐調整社會結構、轉化象徵空間為集體認同機制的研究仍顯不足，未來應更多關注部落空間的在地協商與文化再生產過程。

3. 傳統空間與環境保護

原住民族的空間使用與自然環境之間，長期存在著互依與循環的關係。阿美族在傳統生活實踐中，發展出一套對土地、河川、山林的倫理觀與管理機制，這些知識與實踐體現於地方的語言、儀式與生計活動中，構成所謂的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TEK）。⁵³

太巴塋部落作為阿美族中歷史最為悠久的部落之一，其空間安排與自然地景緊密結合，祭儀場域、耕作地、狩獵區與水源地之間的區隔與連結，反映出一種在地的環境治理邏輯。原住民族對自然環境的

⁵³ 夏禹九、林佩蓉：〈原住民與自然資源經營：共同經營的理論框架〉，《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第4卷第1期（2011年3月），頁39-66。

尊重不僅源於生態經驗，更是文化系統的一部分。在阿美族祭儀中，特定地點如海岸、山坡、溪流被賦予祖靈與神聖性，這些空間的使用受到儀式與禁忌的規範，進而形成一種非書面化的環境保護機制。⁵⁴這類空間知識在太巴塋部落中，是透過年長者長年口述、家族的傳承與部落的集體記憶得以延續。然而，殖民與現代化進程通過地名替換、土地重劃等機制，系統性邊緣化原住民族的空間知識；而部落通過口述傳承、儀式實踐等方式維繫的空間慣習，本質上是對知識霸權的抵抗，亦是重構多元觀念史／概念史的關鍵資源。

近年來，隨著環境正義與原住民族權利議題日益受到關注，部落逐步發展出結合傳統知識與現代環境理念的行動策略。以太巴塋部落為例，族人與在地青年透過溪流復育、生態監測與文化地景紀錄等實踐，積極回應環境變遷，並將傳統空間觀轉化為具政治與文化意涵的生態保育論述。此類行動不僅體現原住民族對環境治理的主動參與，也對抗國家自上而下、技術官僚主導的自然資源管理體系。

然而，現有研究對太巴塋部落空間實踐與環境保護間關係的探討仍相對不足，學術焦點多集中於土地權利與文化保存。對於環境治理如何根植於部落自身的知識體系與價值邏輯，進而發展出具地方性與主體性的治理模式，仍需進一步實證研究與理論深化。

4. 文化空間保護與觀光發展

文化空間保護的概念，根源於原住民族對土地的世界觀與空間實踐。在太巴塋部落的傳統社會中，空間從來不只是物理領域的劃分，更是承載歷史記憶、祖靈信仰與社會秩序的文化地景。祭儀場域、祖先墓地、農耕區與聚落空間等，均嵌入特定的社會規範與精神價值，構成群體認同與情感連結的核心。因此，太巴塋部落對文

⁵⁴ 黃韻蓉：《原住民傳統知識保護法制研究：聚焦於財產權面向之研討》（新竹：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7月），頁38-47。

化空間的保護，應被理解為一種歷史延續與文化再生產的實踐，而非單純的土地保存或資產管理。

隨著觀光產業的興起，文化空間的功能逐漸多重化。部落傳統地景日益被納入市場機制，其神聖性與儀式性面臨重新詮釋與調整的壓力。觀光發展一方面為部落帶來財政資源與社會能見度，另一方面也可能導致文化內容的符號化與儀式空間的功能轉化。例如，太巴塢的豐年祭場域與祭祀路徑，在旅遊活動的導引下，易於被簡化為視覺表演與文化展示場，而非原本具有結構性與再現性的神聖空間。

這種發展模式不僅引發部落內部對「文化真實性」的焦慮，也突顯出文化主體性與外部凝視之間的矛盾。族人在面對文化商品化與觀光需求時，需在「保護與開放」、「展示與隱匿」之間取得平衡。有鑑於此，「文化重建」遂成為太巴塢因應現代觀光壓力的重要策略。部落透過儀式再詮釋、地方知識教育與文化敘事的主動建構，不僅嘗試維護傳統知識體系，也重申對自身空間與歷史的詮釋權。

此外，隨著土地商品化與產權變動，傳統土地使用方式逐漸轉型，部分族人參與土地買賣或接受開發計畫，這對部落的空間結構與社會關係造成新的挑戰。文化空間的保護，因而不僅限於文化資源的保存，更與土地治理、制度安排與經濟自足密切相關。未來研究應深化對部落如何在全球化與現代化浪潮下，發展可持續且具主體性的觀光模式，並強化其對文化表述與空間規劃的自主權。

五、原住民族空間慣習作為東亞觀念史 ／概念史的立場

（一）以東亞觀念史／概念史的框架回應現代性論述的 單一性與中心化

從「漢字文化圈」的文明範式，轉向探討知識生產與現代性之間的張力與異質性中，當代東亞觀念史／概念史的方法論框架，或能成為回應現代性論述單一化與中心化傾向的重要理論工具。以下論述將從三個面向說明東亞觀念史／概念史如何批判現代性論述的單一性，並提出多元觀念／概念場域的可能性。

1. 東亞觀念史／概念史作為對「歐洲中心現代性」的批判

廣義來看現代性(modernity)在社會科學與歷史書寫中，被默認為源於歐洲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有關，其特徵包括理性主義、民族國家、資本主義與世俗化。這種「單一路徑」的歷史模型(one-way modernity)，直接忽視了非西方世界中的歷史動力與知識轉譯。然而東亞觀念史／概念史則主張，應重視「在地現代性」(vernacular modernities)或「多重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之間的差異與轉譯過程。⁵⁵

透過對中國、韓國、日本、臺灣等地的思想、概念與語彙變遷的研究，東亞觀念史／概念史揭示了現代性如何在不同語境中被接受、抵抗、轉化與再創造。例如，「文明」(“bunmei”與“wenming”)、「國家」(“kokka”與“guojia”)、「民族」(“minzoku”與“minzu”)等政治詞彙的發展，皆非單純引入歐洲語彙，而是歷經在地語義的再建構與辯證。⁵⁶

⁵⁵ 宋念申：《發現東亞：現代東亞如何成形？全球視野下的關鍵大歷史》（新北：聯經出版，2019年），頁1-79。

⁵⁶ 山室信一(Yamamuro Shinichi)、黃俊傑、辻本雅史(Masashi Tsujimoto)、楊儒賓、韓東育、張崑將、田世民：〈東亞研究方法論的

然而，阿美族對於空間慣習的觀念，同樣受到上述不同語境中被接受、抵抗、轉化與再創造因素所影響，卻無法保持屬於真實的自我原有的原真性，說明現代性的涉入對於阿美族的文化觀念存在影響力。

2. 觀念史／概念史框架下的「多語政治」與去中心化知識生產

東亞觀念史／概念史並不假定知識來自單一語言或中央政權，而是關注語言、文化與政治權力的交織。以臺灣作為多語社會的歷史空間為例，族群觀念／概念的流動往往透過語言的轉譯與互動性來完成。這種「觀念／概念的多語政治」（politics of multilingual concepts）不僅挑戰了單一語言主導的現代性論述，也暴露出中心邊陲架構下的知識暴力。⁵⁷

當代觀念史／概念史學者也主張應重新思考「中心」觀念本身的構造。歷史上中國中心的「天下」觀如何被轉化為現代民族國家的版圖邏輯，或是日本帝國時期如何將「東洋」概念制度化為帝國治理的工具。⁵⁸然而觀念史／概念史的任務，即便是揭露這些觀念／概念，在特定歷史情境下成為支配性的敘事工具，也無法排除阿美族與生俱來的觀念史／概念史，在東亞觀念史／概念史的主軸之外。

3. 從「他者知識」出發的觀念史／概念史補遺

東亞觀念史／概念史近年來走向，納入「非正典知識」與「他者的知識實踐」。原住民族知識、女性書寫、殖民語境下的在地翻譯。這些被排除於主流歷史之外的知識場域，提供對現代性敘事的有效補遺與解構。

再思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10卷第2期（2013年12月），頁325-403。

⁵⁷ 沈國威：〈《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書評〉，《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7期（2010年9月），頁220-230。

⁵⁸ 鄭文惠：〈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概念變遷／觀念形塑——觀念史／概念史視域與方法〉，《東亞觀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6月），頁223-302。

然而，更具批判性的阿美族的空間命名系統與神話地景敘事，也展現了非國語體系之下的空間認識與時間秩序。這些知識無法被納入漢字文化或日本殖民現代性的語言框架，因此需要以「另類觀念／概念生成場域」（alternative epistemic site）來重新定位。

東亞觀念史／概念史不僅是對傳統中國思想史的延伸，更是對現代性單一進步敘事的系統性質疑。透過去中心化、語言轉譯、他者知識等途徑，東亞觀念史／概念史揭示出觀念／概念變遷的多重路徑與異質生成，使我們得以重新理解「現代」作為一種不穩定且多元的歷史建構過程。

（二）從地方出發的觀念史／概念史策略

「從地方出發的觀念史／概念史」，是一種近年興起的重要學術策略，主張將觀念史／概念史研究的重心，從過去對經典文本、知識菁英與帝國中心的關注，轉移至基層社會、地方實踐與日常語言的生成脈絡。這一策略不僅回應傳統觀念史／概念史的局限，也提供理解知識如何在不同權力場域中被挪用、轉化與創造的另一種路徑。這種觀念／概念可以從三個層面說明此策略的內涵與意義：

1. 「觀念／概念」的社會生命：從菁英到日常的轉向

傳統觀念史／概念史多關注政治語彙的歷史變遷，特別是在國家形成與現代化進程中，「自由」、「主權」、「革命」等詞語如何在政治菁英的文本中獲得新意。然而，這些觀念／概念如何被「說進」地方社會？如何被不同社群理解、誤解或再創造？這些問題成為「從地方出發的觀念史／概念史」的重要起點。⁵⁹

⁵⁹ 藍弘岳：〈「帝國」概念在漢文圈的翻譯與流傳：從幕末日本到清末中國〉，《史語所集刊》第93本第1分（2022年3月），頁213-272。

然而地方知識不再只是觀念／概念的「接收者」，而是觀念／概念意義形塑的主體，當進入原住民族社會或殖民邊陲時，會與地方語言、習俗、空間經驗產生錯置、抗拒或混合，產生新的詞彙與語意。這正是一種「概念的地方翻譯」（vernacularization of concepts）的體現。

2. 詞彙政治與語言鬥爭之命名的權力

觀念／概念並非抽象的思想單位，而是被特定語言制度所承載與規訓。因此，「從地方出發的觀念史／概念史」特別關注語言的權力關係。在臺灣，原住民族的地名、植物名稱、社會制度原有一套語義系統，卻在日治與戰後漢化政策中，被迫接受日語或漢語的命名與語義重構。這些命名的「語層套疊」現象不僅是一種語言霸權，更直接影響了地方社群如何認識自身的歷史與空間。因此，觀念史／概念史不再只是分析「概念的語義變遷」，更是揭露「誰擁有命名的權力、誰能定義現實」的鬥爭史。

3. 以地方記憶與敘事重建觀念史／概念史的主體

歷史記憶、口述敘事、歌謠、地景命名、儀式語言等皆可作為觀念史／概念史的材料來源。這種方法拒絕將觀念史／概念史局限於書面語言，而是試圖理解觀念如何在具體的生活世界中被實踐與內化。

然而，阿美族部落歌謠“*O Niyaro'no Tafalong*”記錄了太巴塢每一區塊的地名與空間意涵，這不僅是族群記憶的載體，也是一種對現代國家空間治理體制的另類回應。這樣的知識場域雖被主流歷史所邊緣化，卻提供了另一種觀念／概念生成的節奏與方式。

4. 重新定義觀念史／概念史的範疇與對象

從地方出發的觀念史／概念史，不僅是方法上的修正，更是一種知識論上的挑戰。它強調觀念／概念不是單向輸出的知識，而是

在多重語言與權力場域中交織的結果，所以地方不是知識的邊緣，而是觀念／概念創發的原地與鬥爭現場，所以歷史記憶、口述知識、儀式語言等，皆能成為「觀念／概念的另一種形式」。

這種策略有助於重構一個「異質的觀念史／概念史地圖」，擺脫傳統東亞觀念史／概念史對經典文本與帝國語言的依賴，回應當代對知識祛殖（Decolonizing Knowledge）與多語共存的訴求。

（三）原住民族觀念／概念作為東亞觀念史／概念史的補充

強調原住民族觀念／概念不是東亞觀念史／概念史的補充，而是其批判與重構的契機，必須從理論視角、知識系譜與歷史權力關係三個層面切入，指出原住民族觀念／概念體系如何挑戰「中心與邊陲」的知識框架，並主張其作為觀念史／概念史生產的主體性地位，而非僅是補遺。

1. 去中心化與知識地景的重構理論層面

東亞觀念史／概念史傳統多以漢字文化圈為中心，忽略了在「漢字文化圈」之外仍有豐富、連續而複雜的思想實踐與語言生命。原住民族觀念／概念不是「尚未現代化」或「未開發的文化殘餘」，而是另一種知識生產的邏輯與實踐場域。原住民族對土地、關係、人與自然的理解，透過地名、歌謠、口述歷史所保存的宇宙觀與倫理體系，本身就是對「歷史－發展－文明」線性敘事的有力挑戰。

2. 隱形文本的浮現與語意抗爭的知識系譜層面

阿美族的「隱形文本」做為空間慣習，說明原住民族長期在主流政權支配下持續透過語言、儀式、地名等進行知識抵抗。這些文化實踐與語義形式，不僅承載記憶，更形成對現代性與國族建構的

語義挑戰與批判。透過民族誌（ethnography of knowledge）所揭示的語意重劃與語義剝離歷程，地名從阿美語的 *maifor*（交換之地）變為漢語「南富村」，說明原住民觀念在文化的詮釋方面，反而更能揭示知識被壓制的過程與可能重構的契機。

3. 補遺是作為鬆動現代性敘事槓桿的歷史政治層面

原住民族觀念／概念對於空間、歷史、倫理的理解方式，構成對現代主權、統治邏輯的挑戰，不是為了補齊觀念史／概念史中的空白，而是要重新定義「觀念／概念」、及其擁有生成觀念／概念的正當性。原住民族觀念／概念體系並非東亞觀念史／概念史的邊緣補遺，而是重構其多元敘事的邏輯起點。唯有承認其作為「另類中心」的主體地位，方能突破漢語文本中心論，構建真正包容的東亞觀念史／概念史。

文化轉型的進程中，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獨特的發展過程。儘管在文化轉型的過程中，文化衰弱是一種威脅，但歷史卻證明，沒有任何一種文化能夠永遠處於領先的地位，因為歷史的真相會隨著時間與空間的變遷而改變。相對而言，民族文化也並非絕對優劣，而是反映環境演化下的人類意識與價值存在的本質，以及人類在追求文化發展過程中所體現的普世價值。

六、結論

本文以太巴塋部落為核心案例，以回顧阿美族空間慣習的研究歷程，進一步論證其作為「東亞觀念史／概念史補遺」的學術意義。

阿美族的傳統空間秩序，並非建構於資源最大化或秩序理性之上，反而呈現出某種以「耗費」（*dépense*）、非線性與儀式性配置

為核心的文化邏輯。部落空間中以年齡階層、祖靈信仰、祭儀結構與家族位置所構成的複雜安排，不僅是物質生活的容器，更體現出一種超越現代功利主義框架的世界觀。這種空間文化的運作方式，為理解人類如何透過空間再生社會秩序與文化記憶，提供了深具價值的經驗基礎。

阿美族太巴塢部落的空間實踐，反映出一種非中心、非線性、以分散與象徵為基礎的觀念／概念系統。這種觀念／概念系統在主流現代性論述中長期遭到邊緣化，然而，它所體現的「文化耗費性」與「空間的象徵多義性」，實則揭示了一種不同於東亞主流書寫文化中的秩序性與規訓邏輯的圖像。阿美族以空間作為再生祖靈信仰與家族責任的場所，使得土地不僅是資源，更是族群歷史、信仰與知識的場域。這種空間觀挑戰了現代國家與漢字文化圈中，將空間視為治理與控制對象的觀念結構。

過去主流的東亞觀念史／概念史研究多聚焦於儒家經典傳統、漢字文化圈的演變、帝國治理的思想制度等範疇，相對的，原住民族的觀念／概念體系、缺乏文字書寫系統的文化，長期處於被忽視的地位。然而，若從歷史人類學與空間生產的角度審視太巴塢部落，我們可見一個內化於地景、透過儀式與身體實踐持續再現的知識體系。這些知識體系並非缺乏邏輯，而是以口述、身體記憶與象徵秩序為其基礎，並透過儀式、歌謠、空間命名等方式得以世代相傳。

本文特別強調，太巴塢部落在面對日治時期土地編定、戰後保留地制度、當代國土規劃等治理實作時，其空間慣習雖遭到壓縮與重構，然族人仍透過文化再現策略——如儀式空間的重置、祖靈記憶的再講述、青年參與文化復振等——延續傳統空間觀。這些實踐表明，阿美族空間知識體系並非僅屬於過去，而是在現代性壓力下進行著持續的文化協商與轉化。

因此，若要真正將太巴塢部落的空間觀納入東亞觀念史／概念史，需進行四個層面的方法論反思與調整：首先，排除將觀念史／概念史簡化為中央政權與文字菁英傳統的知識系譜書寫；其次，迴避以線性歷史觀與「未開化－現代化」的敘事框架；第三，批判東亞觀念史／概念史中對漢字文化單一中心的偏重，進而打開對邊緣文化多樣性的認知通道；最後，需接納阿美族非文字性、儀式性與身體性知識體系的在地文化表述，並聯結其於殖民、開發與國家形成過程中的觀念／概念轉化軌跡。

綜合而言，太巴塢部落的空間實踐與文化觀念，並非可簡化為一種地理與環境適應策略，而應被理解為一套自主、具有深厚內在邏輯的觀念系統。它不僅揭示人類社會與自然空間互構的可能性，也為東亞觀念史／概念史的知識邊界提供重要補遺。正因如此，我們應以更開放的視角，納入太巴塢部落與其他原住民族群的知識系統，促使東亞觀念史／概念史真正轉化為能夠容納多元文化邏輯與歷史經驗的公共知識場域。

徵引書目

- 山室信一（Yamamuro Shinichi）、黃俊傑、辻本雅史（Masashi Tsujimoto）、楊儒賓、韓東育、張崑將、田世民：〈東亞研究方法論的再思考〉，《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10卷第2期，2013年12月，頁325-403。
- 孔飛力（Philip A. Kuhn）著，陳兼、陳之宏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4年。
- 王錦雀：〈日本治臺時期殖民與教育政策之演變〉，《公民訓育學報》第11期，2002年2月，頁131-157。
- 吳進安：〈清領時期臺灣書院教育的儒學思想〉，《漢學研究集刊》第1期，2005年12月，頁116-118。
- 宋念申：《發現東亞：現代東亞如何成形？全球視野下的關鍵大歷史》，新北：聯經出版，2019年。
- 李文良：〈林野整理事業與東台灣土地所有權之成立型態（1910-1925）〉，《東台灣研究》第2期，1997年12月，頁169-196。
- 沈國威：〈《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書評〉，《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7期，2010年9月，頁220-230。
- 那莫·諾虎：〈Ka-kita-an我們之處，非「部落主義」的我群觀〉，《新社會政策雙月刊》第49期，2017年2月，頁26-31。
- 周婉窈：〈日本在臺軍事動員與臺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1937-1945）〉，《臺灣史研究》第2卷第1期，1996年6月，頁85-126。
- 林素珍：〈原住民族歷史轉型正義：空間之歷史記憶的建構〉，《原住民族文獻期刊》第37期，2018年12月，頁3-20。
- 林榮康：〈太巴塌部落空間表徵我族詮釋之研究彙整與回顧〉，《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第27期，2020年6月，頁121-156。

- 林榮康：〈太巴塢部落saksakai遺址家屋研究〉，發表於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主辦：「臺灣人類學與民族學學會2021年會」，2021年9月25-26日，頁1-27。
- 林榮康：〈太巴塢部落空間慣習調查訪談紀錄〉（田野調查筆記），太巴塢部落禮勞區，林福喜口述，2022年8月13日。
- 林榮康：〈太巴塢部落空間慣習調查訪談紀錄〉（田野調查筆記），太巴塢砂勞部落，孫勝雄口述，2022年8月14日。
- 林慧君：〈臺灣日治時期地名變更小考——從日語觀點來看〉，《臺大東亞文化研究》第3期，2015年10月，頁141-159。
- 洪致文、馮維義：〈清末以來臺北盆地歷史地名的空間認知相對方位改變〉，《環境與世界》第28-29期，2014年6月，75-96。
- 原英子著，黃宣衛主編，黃淑芬、江惠英、林青妹編譯：《台灣阿美族宗教世界》，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5年。
- 夏禹九、林佩蓉：〈原住民與自然資源經營：共同經營的理論框架〉，《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第4卷第1期，2011年3月，頁39-66。
- 高進福：《一個Mifuting的休閒空間～以中興部落集團捕魚為例～》，屏東：美和科技大學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23年1月。
- 張啟雄：〈東西國際秩序原理的差異——「宗藩體系」對「殖民體系」〉，《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9期，2013年3月，頁47-86。
- 張學謙：〈聯合國追求語言多樣性與語言人權對台灣國家語言發展法的啟示〉，《新世紀智庫論壇季刊》第84期，2018年12月，頁53-61。
- 黃應貴：〈導論——空間、力與社會〉，收於黃應貴主編：《空間、力與社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年，頁1-37。
- 黃韻蓉：《原住民傳統知識保護法制研究：聚焦於財產權面向之研討》，新竹：國立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7月。
- 楊志誠：〈「皇民化文化」、「皇民化意識」與「台灣主體意識」〉，《海峽評論》第123期，2001年3月，頁30-32。

- 詹素娟：〈熟番身分論：以日治時期的身分登錄為中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文化創造與社會實踐」研討會，2008年11月7-8日，頁1-19。
- 鳳林鎮公所：《日治時期太巴塌部落測量地圖集1-26圖》，花蓮縣光復鄉：東北社區發展協會，調圖日期：2020年7月28日。
- 蔡志偉：〈民族法主體之建立：臺灣原住民族自治之視角〉，《臺灣原住民族法學》第1卷第1期，2016年7月，頁77-86。
- 鄭文惠：〈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概念變遷／觀念形塑——觀念史／概念史視域與方法〉，《東亞觀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6月，頁223-302。
- 鄭正誠：〈日治時期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原住民調查（1909-1922）〉，《臺灣文獻》第53卷第4期，2002年12月，頁25-48。
- 鄭瑩憶：〈仰沾聖化、願附編氓、康雍朝「生番」歸化與番人分類體制的形構〉，《臺灣史研究》第24卷第2期，2017年6月，頁1-32。
- 藍弘岳：〈「帝國」概念在漢文圈的翻譯與流傳：從幕末日本到清末中國〉，《史語所集刊》第93本第1分，2022年3月，頁213-272。
- 顏愛靜、陳亭伊：〈原住民族土地制度變遷及課題與對策之研析〉，《台灣原住民研究學報》第2卷第2期，2012年6月，頁1-25。
- 顧恒湛：《再殖民、地緣政治與抵抗：戰後臺灣原住民族形塑之研究（1945~1984）》，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9年6月。
- Namoh Nofu Pacidal：〈Kakitaan資源利用制度儀式與礦權：太巴塌社為例〉，《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第8卷第1期，2018年3月，頁173-190。
- Namoh Nofu Pacidal：〈不恥下問的諮商同意權起於自決不足的FPIC〉，《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學報》第8卷第2期，2018年6月，頁97-115。

- 安藤敏朗：〈植民地と「バイリンガリズム」——安藤正次と台湾〉，收於山路勝彦、田中雅一編著：《植民地主義と人類学》，兵庫県西宮市：関西学院大学出版会，2005年11月，頁165-180。
-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London: Verso, 2006.
- Bourdieu, Pierr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Ching, Leo T. S. *Becoming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Form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 Culbertson, Carolyn. *Words Underway: Continental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International, 2019.
- Foucault, Michel.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2.
- Geertz, Cliffor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 Giddens, Anthony.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 Gluck, Carol, and Anna Lowenhaupt Tsing, eds. *Words in Motion: Toward a Global Lexico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Koselleck, Reinhart.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 Translated by Tod Samuel Presner and others, with a foreword by Helen Whi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 *Futures Past: 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eith Trib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2004.
- König, Ekkehard, and Peter Siemund. *Intensifiers as Targets and Sources of Semantic Change*. In *Historical Semantics and Cognition*, edited by Peter Koch and Andreas Blank. Berlin: Mouton, 1999.

-
- Liu, Lydia H.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Nora, Pierre.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Spring 1989): 7-24.
- Sauer, Carl.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Geography* 2 (2008): 315-321.
- Scott, James. "Domination, Acting, and Fantasy." In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 "Nature and Space" and "Cities, People, and Language." In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Shmuel, N. Eisenstadt. "Multiple Modernities." *Daedalus* 129, no. 1(2000): 1-29.